

第一章

词典与词典学

词典是什么

古今中外各类词典多半都给“词典”这个词儿下过定义，将各种定义排列在一起比对也许是很有趣的。不过，限于篇幅，这里只引述中、英、法各一部词典所下的定义。

词典是：

“汇集语言里的词语，按某种次序排列，并一一加以解释，供人查阅的工具书。”（《辞海》）^[1]

“处理一种语言的单个词（或这些词的一些特殊类别）的书本，显示词的拼法、发音、意义、用法，以及同义词，词的派生与历史，或至少显示上述某些方面；为便于查阅，单词按一定次序排列，许多语言都按字母顺序安排；在大型词典中，所提供的信息附以文学的例子。”（《新牛津词典》）^[2]

“一种语言的单词或人类活动一个领域的单词的汇集，由若干词汇、编辑而成，一般按字母顺序排列，且就每个单词提供有关其意义和用法的若干数量的信息，并供一定的公众使用。”（《法语宝库》）^[3]

这三个定义分别取自三部其权威性都不容置疑的词典，孰优孰劣不易比较，而且后两者是译文，难免有不尽贴切的地方。若光从字面上推敲，很可能迹近文字游戏。国外有的词典学家推崇《新牛津词典》的定义，认为它最为完备，有的则持相反的意见，觉得它比较松散，带有添枝加叶的成分。我们这里不从比较这三个定义着笔，而只据此来讨论词典的特有属性。“词典是……工具书”（或“词典是……汇集”）虚点之处究竟包含什么成分呢？按上述三条

定义，起码可以归纳出如下四点：

1. 汇集词语（含词语的某些组合或成分）。当然，不是汇集任何文字材料都可以成为词典的，因此年表、目录、清单等就不属词典之列（虽然有些能成为词典的附录）。

2. 按单个条目分别处理。不像一般书籍那样，要求全书前后意义连贯。举例来说，《现代法语词汇学简论》是一般书，《英语科技常用词汇汇编》则是词典。

3. 提供一定数量的信息。词条提供信息的内容和数量因词典的性质和规模而异。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一般均作注音和释义间附例句基本无引例而《辞源》则提供较详尽的引例。至于“一一加以解释”那是传统的提法未尽确切。因为有些词典并不作解释，例如诗韵词典，它只提供韵母相同的词便算完成任务。诚然“提供信息”的说法可能不太通用不过它较之“一一加以解释”看来要准确或周延、完整一些。

4. 按一定方式编排。有音序、义序、形序（包括按字母顺序）等各种编排法，这和普通书籍的分章分节等大不相同。

将上述四点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试把“词典是……工具书”中的虚点填满，那便成了：

词典是汇集词语（含词语的组合或词语的某些成分）、加以分别处理、提供一定数量信息、并按一定方式编排的工具书。

从前谈诗的人多有给诗下这样或那样的定义的，却并不见得就有助于诗学的发展。因此我们也无须在词典的概念上兜圈子，还是来谈点实际问题好了。

是真正的词典而不冠以“词典”之名的中外都有中国的《尔雅》、《方言》可以为例英国 1573 年出版的《蜂房》（*An Ahearie*）与养蜂无关，而是一本地地道道的词典；法国 1853 年出版的《上帝、人和言》（*Dieu, l'homme et la parole*）亦非论述宗教问题而是一部法语词源词典。词典不一定以“词典”为名，看来这一点谁也没有异议。但冠以“词典”之名的是否都是真正的词典呢？国外早已有

人提出疑问，近年来国内也有所争议。法国有的词典家认为，像伏尔泰的《哲学词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福楼拜的《现成看法词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都不是真正的词典，正如作家所写的格言集也不算词典一样，因为那都是个人见解的汇集，是创作，只不过按关键词的字母顺序排列而已。与此相近，美国比尔斯(A. Bierce)的《魔鬼辞典》(*The Devil's Dictionary*)也不是真正的词典。推而广之，某些词典家还认为，像目前西方社会所流行的《笑话故事词典》(*Dictionnaire des histoires drôles*)、《妇女词典》(*Dictionnaire des femmes*)等都不是真正的词典。前者是笑话故事集，后者是妇女手册，也都仅仅是模仿了词典的排列法。

如何从理论上把真正的词典与徒有其名的“词典”区分开来，这牵涉到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问题。

词条表示的成分可以有两个方面：指物符号与所指之物。且举词条“猪”为例：

动物名 学名为…… 旧为猪的异体字 亦通豮。[指物符号]

一种家畜，体肥多肉，肉可以吃……。[所指之物]

一般词典对“指物符号”的描述与对“所指之物”的解说常常是混在一起的。仍以“猪”为例，《汉语常用字典》(浙江人民出版社)是这样释义的：

猪 家畜名 主要供肉食之用 鬃、皮为工业原料 粪可作肥料。

显然，“家畜名”是对“猪”这个符号提供的信息，后面的文字才是对“所指之物”的解说。在词典中，如果某些表示具体事物的词条只有对“所指之物”的说明，亦可以认为已暗含关于符号的信息。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中“猪”的释义：

(表示一种)哺乳动物 头大 鼻子和口吻都长……”

“表示一种”的字样是笔者加上去的，前面加了这四个字就令人不难看出，这仍然包含了对“猪”这一符号提供的信息。

专名词条也可以划分“指物符号”和“所指之物”两个方面，例如：

上海 市名，简称沪，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中央直辖市。

很明显，“市名简称沪”这是有关“指物符号”的后文则涉及“所指之物”。

实际上，有的词典只对符号提供信息，发音词典便是一例；另有一些词典则只对“所指之物”提供信息，如某些专科词典便是，某些综合词典则是两者兼而有之的。

有的词典家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对符号提供信息的才是真正的词典。不过，符号是有其内涵的，因而实际上不可能不对“所指之物”作解说。但是，不管怎样，词目是作为符号而存在的，词典是词含词的组合或词的某些成分的一份单子或词的汇集。因此，“家具清单”或“展品清单”就不能算是词典，因为它们是“物的单子”。尽管为了登记“物”不能不用词来表示。这和逻辑学上的概念与词的关系是有类似之处的。明白此点，就可以了解什么是名副其实的词典。法国拉鲁斯出版社曾经遇到这么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位外地读者看了附有精美插图的《拉鲁斯词典》中“自行车”的条目，竟去信出版社要求订一辆自行车。这是把词典与商品目录即把“词的单子”与“物的单子”混淆起来的生动例子。^[4]

中外各家关于词典的定义，尽管措词出入很大，但几乎都一致认为，词典在于“汇集词语”。就目前所见，例外的只有三两家，胡明扬等著的《词典学概论》是其中之一。该书认为：“词典是一种汇集语言、科学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词语和知识，按一定方式编排，以备查检参考的工具书。”^[5]

按此说法，词典是汇集“词语和知识”的。这也许是出于强调词典的“知识性”才这样提的吧。可是，如果说同时“汇集词语和知识”才能成为词典，那么一本逆序词典或一本韵母词典的知识部分又在哪儿呢？

请看如下条目：

炖木瓜

材料：大甜木瓜一个，冰糖一两。

制法：木瓜去皮，切块，去瓢，加冰糖及一碗滚开水炖一个钟头。

五柳鱼

原料：鲤鱼一条，肥瘦猪肉丝一两，干辣椒五个……。

做法：1……；2……；3……；4……。

这两条是分别从粤港两地的食谱中摘引出来的。显然这里提供了确确实实的知识。如果说“汇集知识”即能成为词典，那么食谱也应归入词典之列了。可一般人又为什么不把它视作是词典呢？其实，一本按一定方式编排的烹调工具书，如果是汇集烹调词语加以分别处理并提供有关信息的，那才算是一部烹调词典。如果只在“盐水鸡”、“五柳鱼”、“拌合菜”、“软炸肉”、“罗宋汤”等项下列出原料和做法，无论是按何种形式（音序、义序、形序）编排，都只是一本食谱，读者是据以进行实际操作的。食谱显然是“物的单子”，所以谁也没有将它归进词典之列。通俗地说：凡是从词出发的，便是词典；凡是从物出发的，便不是词典，或者说不是真正的词典。

附带提一下词典的知识性、科学性、实用性的问题。常听说，这三性是词典的“三个根本要求”。这种提法固然不错，不过，对词典以外的工具书也是可以提“三性”要求的，教科书不是也要有“三性”么？可见“三性”并非词典所专有的属性，不是词典的特性。

词典的功用

人们常常称词典是“无声的老师”。在现代社会里，词典成了终身教育的得力工具。从学龄儿童到成年人以至老年人都用得着词典，读者既可从词典中学到语言知识，又可以汲取各种专科知识。参考拉鲁斯出版社主编杜布瓦兄弟（J. et C. Dubois）的意见^[6]，可把词典的功用粗分如下：

1. 帮助读者领会、译述、书写另一种语言，或同操另一种语言的人群交流，这是双语词典或多语词典的功用。

2. 帮助读者凭自己已掌握的普通词语去理解专门术语、科技

词语等 这是各种专科词典的功用。

3. 通过提供有关语义、句法、形态或语音的信息，帮助读者熟练掌握语言的表达方法，提高语文水平，这是单语语文词典的功用。

4. 在词条中提供各种知识，帮助读者扩展认识领域或增加知识的深度，这是各类百科词典和形序百科全书的功用。

当然，上述每种功用还可以细分。例如词文词典的功用就可以分为帮助索解、表达和学习三个基本方面。

总的来说 这位“无声老师”的作用不在于系统“讲授”而在于随时分别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词典与社会

词典作为文化产品，也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是受一定社会条件制约，同时也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状况的。首先，词典的产生、发展都和社会的需要密切相关。且举几个带有普遍性的例子。

1. 古代识字的人不多，拥有文字材料很少，并不产生查阅词典的需要，因此无论在哪个社会，在历史上，词典的出现总比一般书籍晚得多。中国的《说文解字》于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才成书 其时已有相当数量的经籍存在；《说文解字》正是为了适应诠释古籍的需要而编的。法国的词典编纂发轫于中世纪的拉丁语—法语词表 到 1539 年，第一部名副其实的词典——罗贝尔·艾斯蒂安（Robert Estienne）的《法语—拉丁语词典》（*Dictionnaire français-latin*）才出现，主要供学生使用。中外历史上都有过相当漫长的无词典的文化社会时期，而今天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如果缺了词典，那是不可想像的。

2. 社会中的古籍愈积愈多，产生“通古”的需要；操不同语言的人群交往日增，产生了交流的需要。最初的词典大体由于客观存在这两种需要才应运而生。《说文解字》为了满足“通古”需要，自不消说，扬雄的《方言》主要是适应交流的需要。在西方词典发

展史上，最早出现的是双语词典，而从广义来说，我国最初的词典也可以说是双语的。^[7]单语词典、百科词典、专科词典的出现则是晚近的事情。

3. 许多社会都经历过从分裂到渐趋统一的时期。这时候，民族共同语获得很大的发展，于是产生了民族语言规范化的迫切要求。由此，便开始出现规范性的详解词典。17世纪的法国处于绝对王权鼎盛时期，第一部单语法语词典——《法兰西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就在这个时期问世，它至今共出九版，其传统保持不变，也就是所谓“保卫法语，避免一切破坏因素”^[8]。英国约翰逊的《英语词典》也是一部规范词典，它提出要“稳定我们的语言的发音，保持我们的语言的纯洁”。我国的《现代汉语词典》更是典型的规范词典。它在其“前言”中明确指出：“这部词典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在字形、词形、注音、释义等方面，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难想像，一个群雄割据、四分五裂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对规范词典的需求的。

4. 近代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的知识总量大大增加，“名”与“物”的词典开始分家。专门解决“物”（或知识）的问题的词典陆续出现。法国自18世纪开始，以传播新知识为己任的“科学工艺”词典开始相继问世。至现代，无论哪一个文明社会都拥有各种类型的不收语文词条的专科词典，而语文词典也不得不收进若干数量的通用百科词条。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达，不少百科词汇已成了普通词语，从而有此迫切需求。

5. 现代社会文化知识大大普及，因此可到达广大读者手里的中小型词典，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在激增。法国的《小拉鲁斯》（*Le Petit Larousse*）自问世以来行销3000多万册，历久不衰，现在已差不多进入每个普通家庭。我国《新华字典》的发行量超过《小拉鲁斯》，目前中小学生几乎人手一册。最近几年，我国光是中小型的语文词典已出了好几十种，显然，这种发展是适应社会上文化普及的需要的。

再者，从另一角度来说，词典的编纂出版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也举几个带普遍性的事例。

1. 词汇的变化发展（新词产生、旧词消亡、词义演变等）是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状况的，因此某一时期的词典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该时期社会的某些情况。有人将 1948 年版和 1960 年版的《小拉鲁斯》加以比较，发现增加了 3973 个词；而新增的词中只有 9% 属普通词汇，其余都是各学科的科技词汇；1960 年以后的版本则增加科技词汇还要多。从中可窥见法国社会的科技发展。拿旧《辞海》和新《辞海》“电”字下的条目比较一下旧《辞海》收 116 个条目新《辞海》收 374 个，净增两倍多；有些今天可说是家喻户晓的单词不见于旧《辞海》如“电扇”、“电钟”、“电冰箱”、“电视剧”、“电话会议”、“电子计算机”等。再试比较新旧《辞海》“社”字下的词目旧《辞海》收 39 个新《辞海》收 115 个，增长几近三倍；有些目前常见的政治词汇在旧《辞海》中找不到踪影如“社会分工”、“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帝国主义”等。人们常说从一滴水看大海，光从这两个字下的词目，也可以瞥见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变化的端倪。

2. 词典史上划时代的宏篇巨著多半都是在社会较为稳定的时期经营的。这是因为大型词典工程浩大，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往往无暇顾及于此而当社会相对稳定的时候对语言、知识、文化作归纳、提炼、总结的需要便突出了。《说文解字》产生的年代正是东汉社会相对安定、经济上有所发展的时期。有时候，在这样的条件下还可能连续产生不同特点的纪念碑式的词典。法国的《利特雷词典》（*Emile Littré: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和拉鲁斯的《万有大辞典》（*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都在 19 世纪末叶相继问世，当时的法国资本主义社会处于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我国的《辞海》在抗日战争之前首次和读者见面到 1958 年才开始全面修订在“文化大革命”后的 1979 年才正式出新版本。只要人们仔细考察一下，便不难了解：一部大型词典的命运或多或少是和社

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3 词典的编纂、印制、装帧技术以及出版周期、发行数量、种类多寡等等，不消说是反映一个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例如，印刷技术提高，才能广泛发行插有彩图的词典；有了自动拼版技术，才能以较短的周期连续修订出版某一种词典。电子词典的问世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词典的出现自然是应用因特网的结果。至于语文词典的质量如何、种类是否齐全，这是和整个社会的语言研究水平密切相关的。双语词典是否发达，则又和某一国家的民族状况、对外交往、科技水平等有相应的关系。

词典是社会需要的产物，词典又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随着文化教育的全面普及、终身教育的推广、科技的突飞猛进，可以预期未来社会中的词典在数量、质量、品种等方面都会有飞跃的发展。我曾经介绍过这么一种观点：查阅的东西比读的东西还要多的时代将会到来。总有一天，由于人类知识的总和达到如此广博的程度，以致不得不改变教学的目的和方法，那时候主要的不再是传授某门知识，而是教给学生凭借工具以猎取知识的手段。^[9]世界许多国家的辞书在整个出版物中所占的比例都在增长。据统计，法国在最近几年中，这一比例从 15% 上升到 23%。我们从中可约略看到这方面的发展趋势。为了使词典出版事业适应目前的社会需要，为了更好地规划未来，应当大力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词典问题作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

词典与意识形态

一定的社会存在产生一定的意识形态。既然词典与社会的关系如此密切，词典也就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不可排除的关系。这种关系大致从下述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1. 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哲学思想对词典的编纂宗旨、词典的总体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洪笃仁先生指出过：《说文解字》的宗旨与体例“所包含的宇宙观及其构拟的世界模式，是东汉经师的

见解”；所建立的部首从‘一’部开头体现‘唯初太始，道立于一’的意义，……最后归结到‘亥’部体现‘亥而生子，复从一起’的意义’。^[10]也就是说，《说文解字》曲折地反映了汉代古文经学家的思想。在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推动了狄德罗《百科全书》（*L'Encyclopédie*）^[11]的编纂，使《百科全书》成为唯物主义的战斗武器。

2. 地域上的不同政治环境、社会条件使词典带上不同的思想色彩。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概念方面，它促使词典家避开一些‘危险’的字眼（性爱的、政治的或宗教的）在语言方面，它排斥一些‘不正规’的词句和用法（这种‘不正规’是就一定社会环境来说的，在另一环境中，可能会有另外的衡量准则）。单就选词来说，例如海外出版的《当代汉英词典》在‘共’字下收“共党”、“共谋”、“共产集团”等含贬义的词语，我国大陆出版的《汉英词典》则不收上述词目，而多收“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青年团”等词语。收词的差别固然反映编者的观点不同，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恐怕更重要的是受所处政治环境、社会条件的制约。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意志影响词典编纂的情况尤为突出。钦定的《康熙字典》发行后，连续一百多年只获得一片赞扬之声，无人敢针对它的缺点说个“不”字。王锡侯编的《字贯》略有纠正《康熙字典》之处，并在“序言”中有对其讥讽之嫌，加之在书中不对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名字避讳，便被皇家定罪，《字贯》书版也被销毁。

3. 在释义方面，编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自己的思想意识。自然，编者个人的观念又是和社会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古今中外的词典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就拿“妇”字来说，我国封建时代的词典对此字的释义，几乎无不带上封建意识的印记。什么“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妇，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妇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等不一而足。现代的汉语词典才给了“已婚的女子”这样不带封建色彩的释义。外国词典也有类似的情况。1835年的《法兰西学院词典》就把 *femme* ‘女人，妇女’释作“雌性，

男子的伴侣”而对 *homme* 男子、男人 却不给予“ 雄性、女子的伴侣 ”的相应释义。很明显，以男性为中心去释“ 妇女 ”那不过是男尊女卑思想的一种表现。连“ 妇女 ”这样的普通词尚且如此，遇到与政治有关系的词汇，编者会在释义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注入自己的思想观点，那就更不必说了。

4. 词典编者不可避免地凭自己的意识和爱好选择用例，这类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约翰逊的《英语词典》很少引用笛福的作品为例，据说是因后者所笃信的教派与约翰逊不同之故。《利特雷词典》宁愿用古例而拒绝引用新作家的例子，是因为编者受孔德哲学的尚古观念支配。有宗教信仰的编者常常离不开反映宗教意识的词例。《大罗贝尔》词典中“ 爱 ” 条的第一个词例是“ 人类对上帝之爱 ”(*L' amour de l' homme pour Dieu*)。旧版的《法兰西学院词典》在 *femme* 下竟举了这样的词例：“ 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女人。”^[12] 现代西方社会个人主义意识强烈，因此词典中不乏赞扬承认个人权利的例句；而在我国新编的词典中则不难找到反映社会主义风尚、赞扬集体主义精神的词例。

当然，上述词典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表现，是就其总体而言的，不是说每个词条都反映一定的意识形态，也不是说任何词典都强烈表现这种关系；但就大型语文词典或大型百科词典来说，要超越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从历史上看，词典或多或少地反映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居多，但也不尽如此，在社会条件容许的情况下，词典家亦可以将自己的著作作为对抗统治阶级意识的武器。拉鲁斯的《19 世纪万有大辞典》是一个例子。编者用它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意识和宗教观念进行斗争。法国词典家马托雷在其著作中写了这么一个有趣的例子：他的祖父常常应小作坊工人的请求，给他们朗读拉鲁斯词典中的“ 自由 ”等条目，读后他们往往展开热烈的讨论，一起来构想“ 摆脱偏见的自由博爱的社会 ”。^[13] 可见，词典与意识形态是关系密切的。现今提倡词典编者自觉地以先进意识去指导词典编纂工作，仍然有其必要性，因为词

典常常是无声的“教育者”。当然，这不等于要词典家放弃编纂工作的客观准则，大搞“穿靴戴帽”，也不是要他违背不同种类词典的目的要求，乱贴标签。

我国曾有段时间过分强调词典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闹出了很多笑话，也使编者吃了不少苦头。今天不能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无视词典与意识形态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西方已经有人就这个问题出了专书^[14]，我希望我国也不要忽视这方面的研究。

词典与语言研究

就目前所见，利用词典进行语言研究有两种做法：一是借助几种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词典并运用其他有关书证，对某些词语进行分析、考证、辨伪。在我国，这方面的文章较为常见。二是就某一部词典的先后不同版本进行比较，或对某一类型词典的有关部分进行对比，从中理出某个时期的语言发展（尤其是词汇演变）趋势或考察某种语言现象。国内不大见到此类研究文章，这里稍举国外的实例说明一下。

笔者首次见到的有关专文发表在1960年的《现代法语》（*Le Français moderne*）上，题为《从一本通用词典看1949至1960年法国词汇演变的总趋势》^[15]。以杜布瓦（J. Dubois）为首的四名词典家，将《小拉鲁斯词典》1949年与1960年的两个版本进行对比，考察了好几个重大问题，如：“1949至1960年的词汇演变总趋势”、“形态演变趋势”、“语义演变趋势”、“外来词问题”、“近十年的技术演变”等。有些调查结果十分有趣。例如，据统计，这十年间删去14%的词汇，增加11.4%，词义有所增删的词占12%，“总之，词典中近25%的词汇变了”。又如，虽然总体上词汇的删多于增，但专业词汇却相反，增远远超过删。增的主要是生物、医药、政治、经济学、工业技术方面的词汇，删的主要是过时的手工艺方面的词汇。至于“人造卫星（spoutnik）”、“登月”（alunir）之类词汇，不消说是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才收进词典之中的。因此，一部通用词典中词目

或词义的增删变化，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发展状况。

当然，要进行这种对比研究，不是用任何词典都可以的。文章的作者选中《小拉鲁斯词典》是考虑到下列诸因素：（1）该词典再版频繁。（2）其编纂宗旨是力求成为“我们语言的活镜子”换句话说，该词典能紧跟现代语言的发展步伐。（3）该词典的发行地域、读者阶层、销售数量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4）该词典有多人参加编纂，而且编纂人员不时有所更新，可避免囿于某一编者的偏见。（5）最后，要加以比较的两版具有延续性，词汇总量相对平衡；如果后一版已彻底改编，变成另一种词典，那就无从比较了。

另有取其他词典如基础词典、频率词典等进行别的方面如词缀、词源研究的，这儿就不详叙了。

随着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不同种类的词典趋于齐备，词典再版周期缩短，可以说，以词典为原始材料进行各种语言研究的工作也会开展起来，并肯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考察出语言的发展状况、人们对自己语言认识的变化以及语言观念的演进。

在词典发展史上，词典与语言研究还有另一种关系，那就是有些词典并非为适应社会的交际需要而编，而仅仅是少数饱学之士利用词典的形式去描写某些陌生的语言，目的是开展对语言的科学研究。

词典学与语言学

将英语的 *lexicography* 或法语的 *lexicographie* 译为“词典学”，一望而知，这就是以词典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但我国的“辞书”是字典、词典和百科全书的统称，外延较广，“辞书学”这一术语未必能被 *lexicography* 所包容，因而我宁愿仍然沿用“词典学”的称谓。目前所见，词典学的研究内容，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1. 词典史研究，包括对历史上的词典的考证以及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考察词典发展史。

2. 词典理论研究，论述词典的性质、结构、类型，各种词典的

特点和功用，也包括阐发新型词典的编纂原则，探讨邻近学科对词典发展的影响等。

3. 词典以及词典学的比较研究，包括宏观比较、微观比较，共时比较、历时比较 横向比较、纵向比较 等等。

4. 词典编纂法研究，即对实践的研究，包括词典的总体设计、编纂的组织工作、审读制度、蓝本资料的利用，等等。

5. 词典编纂工艺研究 例如 自动化方法的探讨 语料库的应用，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编纂工艺的革新，电子词典、网络词典等非书本式的新型词典的研究，等等。

有人把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分别称为：1. 词典史学；2. 理论词典学；3. 比较词典学；4. 应用词典学；5. 词典工艺学。这样称谓似乎学术气味更浓一点。

也有人按所研究的词典类型不同而给予不同的分科称谓，例如 语文词典学、专科词典学、双语词典学、特种词典学、综合性词典学，等等。笔者以为，对词典学不论分哪几个方面进行研究，都是可以的，但每一个方面都以“学”字命名，总嫌不妥。^[16]

关于词典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各家的说法不一，分歧还很大。杨祖希先生早期的见解是：“词典学是语言学的一门学科”^[16]，广义词汇学，就是包括词典学在内的”^[17]。就我所见，外国的词典家也大致持相同的看法，即词汇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词典学则是应用词汇学的一个方面。国外好些词汇学专著即包含词典学部分，而词典学著作中也常常以其前半部或后半部论述词汇学问题。^[18]关于语言学和词汇学及词典学之间的关系，苏联词典学家多罗雪夫斯基 В. Дорошевский 的意见仍然值得参考：“当今的时代，乃是作为语言的理论科学的语言学，作为研究词的科学的词汇学，作为研究词汇材料的区分和在词典中反映方法的科学的词典编纂学这三者综合集成的时代。”^[19]

由于近代词典编纂事业的迅速发展，大量实践为词典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又由于近代语言学的飞跃进步，新的语言学理论为

词典体系构思、总体设计、词义辨析展示了新的途径。词典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成为一门有自己的特殊研究领域，有自己的任务和方法，获得相对独立地位的学科。关于词典学和语言学的关系，国人早期的看法一般是如图 1-1 所示的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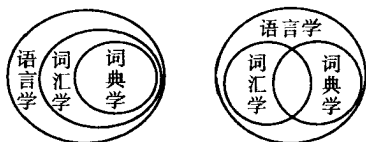


图 1-1

第一种看法长期占主导地位，《辞海》的《语言文字分册》就是这样安排的。它把“词典学”放在“词汇学”类目下，释义中说明词汇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对“词典学”则下了这样的定义：“语言学的一门学科，研究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的性质及其编纂的原则和技术。”第二种看法突显了词典学的地位，将词典学和词汇学视为既相互联系而又各自有其独立性的两门平起平坐的学科。上面两种看法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只是强调词典学独立地位的程度不同而已。

但还有第三种见解，以《词典学概论》^[20]作者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各种各样词典的相继出现，迫使词典学要从语言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与之发生联系的学科也不再是语言学一门。哲学词典和哲学有关，法律词典和法学有关，植物学词典和植物学有关，天文学词典和天文学有关，一部兼收词语和百科条目的综合性词典则更是囊括了有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切门类的知识，对它的研究，当然也就势必要和一切门类的学科发生联系了。”

据此看法，语言学与词典学的关系就如图 1-2 所示，这里有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其一，是不是词典囊括了有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切门类的知识，词典学便变成了近乎无所不包的学科？如果是，那末以词为研究对象的词汇学又是什么学科呢？词汇中有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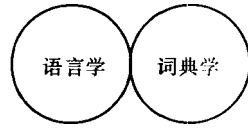


图 1-2

门学科的词汇，而词汇学是早于词典学的，但是词汇学并不因此而被认为是无所不包的学科。原来，词汇学一直将词作为“指物符号”看待，并不去研究其“所指之物”，因此不产生上述的混淆。这正如逻辑学一样，尽管它的原理和规则可以应用于一切科学（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但它又是与天文学、动物学、心理学等具体学科互不相干的。设想词典学真的要是一切门类的学科发生联系，那么今天在知识领域分科日细的情况下，就很难研究得了。

其二，词典学是否已从语言学中脱离出来？这里可以先不下结论。但我在“词典是什么”一节中说明：“词典是词（含词的组合或词的某些成分）的一份单子，或词的汇集”。只要承认这点，那么研究“词的单子”的词典学就很难和语言学完全脱离干系。可能有人提出质疑：今天的词典编纂已经涉及到机械化、自动化等问题，这不就是“词典学要从语言学中脱离出来”的标志吗？我看未必如此。语言学中的一些分科运用先进科学技术进行工作是常见的事，例如语音学就应用了物理学中的许多声学手段，心理语言学就使用了心理学中许多观察和实验手段，与词典学有密切关系的词汇学那就更不用说了。其实，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技术首先是在词汇研究中运用，然后才逐渐应用到词典编纂上来的。这些学科都没有从语言学中脱离出来，又怎么能以此作为词典学独立于语言学的根据呢？

从词典学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我更倾向于多罗雪夫斯基（В. Дорошевский）的见解而形成第四种看法，如图 1-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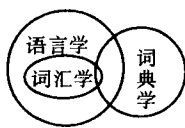


图 1-3

如图所示，这种看法既承认了词典学的相对独立性，又肯定了它和语言学及词汇学的密切相关地位。这种见解也许更有利于有关学科的相互渗透，彼此合作，从而更有力地推动词典学的发展。

尽管对词典学地位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中外词典家有一点意见倒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词典学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有待于大力发展和完善。许多国家的词典编纂历史都不短，而且大都把词典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门学科，但词典学的兴起却较之语言学中的语音学、语法学等晚得多，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大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

1. 一般语言学家都重分析，无论语法学或语音学都是精密分析的产物，而词典家搞的是归纳、综合的工作，分析和综合这两种思维方法虽不能截然分家，但着力点却是不同的。

2. 语言中的语音和语法尽管都在变动，但变动较慢，相对地易于把握，而词汇的演变最快，研究的难度自然大得多，因此语音学、语法学很早便成为语言学中的独立学科，而词汇学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在现代语言学中迟迟找不到它的适当位置；词典学原属词汇学的分支，自然面临相同的命运。

3. 一种语言的语音和语法是有限的，而词汇量虽则不是无限的，却要庞大得多。从操母语的人来说，一般自小便掌握了语音、语法，许多人以后可以一辈子无需再学习；而对于词汇则不然，要毕生不断扩充，才能适应交流的需要。因此，购备词典的家庭不少，而买语法书放在家里的却不多，更不用说语音书了。再说，普通有文化的人掌握 2 万个词就已经很了不起，而大语种的词汇都在 20 万以上，专名还不算在内。描述个人平常已掌握的少数词汇还容易做到，但词典家面对的是浩瀚的词的海洋，要对每个词加以系统描述已经相当困难，更何况将编纂工作提到理论的高度。

应该承认，尽管许多人都强调语言学和词典学的关系，但实际